

# 扎西会议与毛泽东的战略哲学观

杨伍荣

## 战略转进——从权宜之计的选择到酝酿新机的转变

毛泽东在扎西推动的战略转向，主要体现为两个关键方面：一是成为战略转向的推手，二是作为战略对弈的棋手。

作为战略转向的推手，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首次战略建议即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1935年1月，中央红军按遵义会议决定向赤水、土城转移，但土城战役受挫，敌军已在川南布下“口袋阵”。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转向扎西一带集结。向扎西集结成为战略转移的突变点和历史发展的“质变点”。扎西地处川、滇、黔三省接合部，占据此地即赢得战略主动。这一转兵促成四渡赤水的大转折，一步棋盘活全局。从改变北渡计划到重返黔北，毛泽东与中革军委重新谋划出新的战略链条。1935年2月3日至10日，中革军委连续电令各军团由川南向扎西转移，再转向黔北。

作为战略对弈的棋手，毛泽东重掌军事指挥权后，通过四渡赤水逐步扭转战局，而这一战略态势的反转，始于放弃北渡计划、向南集结扎西。在扎西会议前后，毛泽东通过两次战略佯动，成功引起蒋介石两次战略误判。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充分利用扎西地理优势和战略策略，迷惑敌军，致使其对红军行动方向判断失误，观望不前，互相掣肘。从战略预见性看，毛泽东在扎西会议时已可能预见到再次转兵云南、北渡金沙江的布局。在原北渡计划受阻、川滇黔边发展受限的情况下，只有将敌军引至黔北后实施战略大迂回，转兵云南才具有可能性。

此外，毛泽东在扎西筹谋还体现了深刻的战略哲学：一是大方向与小方向的统一，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是总方针，其他行动服从于此；二是化逆境为顺境，在极端不利条件下坚持趋利避害；三是正确处理理性的相对与绝对关系，通过存疑、修正、破局实现战略创新。具体表现在：勇于存疑，将“必然性”选择变为必然胜利；勇于修正，通过无数相对的“一”达成新的绝对的“一”；勇于破局，实现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军事方略三大突破，为红军长征胜利奠定基础。这一战略转进不仅扭转了当时红军的被动局面，更体现了在复杂形势下保持战略定力、灵活调整战术的高超指挥艺术，对今天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 战略反思——总结重大挫折、拨正战略航向

扎西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对长征以来的历史得失的反思之后的

扎西会议是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从渐变实现突变的一个重要转折，毛泽东在扎西会议期间的一系列战略谋划，在新的历史节点推动了关键性的战略转化。毛泽东在推动这一历史转折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深邃的战略哲学观，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略哲学理论。



扎西会议旧址。本报记者 雷桐苏 摄

再反思，从而整体性促进了全军上下接续长征的更高层次的再认识、再实践。《决议》在战略层面面对单纯防御路线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一是战略方针的失误。“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领导者”的战略战术原则之误，体现在长期性方面没有认识到持久战与速决战的关系，在战略路线上机械地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在战术原则上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等。二是战略预判的失策。在中央苏区内外线作战失利的情况下，战略转变的原则与实行突围的方针互相矛盾，一方面要“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另一方面要“发展游击战争”，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三是战略转变的教条。因为“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自相矛盾的战略方针，导致“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以致于“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特别是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时与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更“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决议》体现的战略哲学观在于：一是绝对否定与相对肯定的辩证统一。《决议》突出当时事关全局的主要问题，即军事问题。“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决议》避免批评的两极化，避免过与不及的偏差。二是独立自主与迷信国际的对立统一。对于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的批判，在主张运用“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方面，共产国际的

## 战略突破——由局部的战

**术转变引发全局的战略裂变**

“四渡赤水”打破了兵家“战胜不复”的铁律，三次重复同一战术而不被敌人识破。而“四渡赤水”的战略转变是从扎西会议开始的。二渡赤水所体现的战略战术之奇在于：一是战略思维之奇。毛泽东在关键时刻的逆向思维扭转乾坤。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的想法出人意料，他认为：我们不要往西走了，要调头往回走，往东重新回到贵州境内去。因为敌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而黔北则防守空虚。二是战略方向之奇。在当时的可选方向中，回师黔北是唯一的最优方向，没有更优方向。三是目标选择之奇。在当时所有的战略打击对象和目标中，黔军王家烈部是最弱的。四是进军线路之奇。四渡赤水最突出的战略特点就是打破“战胜不复”的惯例，此中的“第一复”即二渡赤水是从扎西会议酝酿并实施的，会议作出的回

师东进的战略决策，因局部的战术裂变而引发全局的战略裂变。

二渡赤水所体现的战略哲学观在于：一是战略收益与战略风险的权衡。既要追求利的最大化，就要充分考量害的可能性程度。在料敌于先的前提下，谋划好环环相扣的战略战术诸环节，二是大战役之小战略与小战役之大战略。二渡赤水之所以在战役层面称为“大战役之小战略”，就是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形势而言，即40万对3万多人的现实性而言可谓“大战役”，必须从战略策略的精细处谋划和准备。在战略层面称为“小战役之大战略”，是因为中央红军的数量与所打击的对象即王家烈所部形成绝对优势，但同时为了确保一战而胜，因此又要从大战略的角度来谋划小战役。

## 战略重构——从径直外求

**转向反向内求的历史性转变**

扎西整编及其一系列战略部署将“有形之兵”转化为无形之势：扎西整编一开创了我军能上能下军队改革的历史先河。开创新苏区，组建红军川南游击队——由集中行动到分散发展的新阶段，对中央苏区的新部署——暂时退却是为了将来的胜利复归。

扎西会议的战略部署所体现的战略哲学观在于：一是以镒称铢与以铢称镒的辩证统一。以镒称铢是以大量小，以铢称镒是以小量大。以此思维达成大小、强弱两种事物的互相转化，找到优势与劣势、强大与弱小之间的具有物质、精神等因素或条件的“中介”，即两者之间的过渡条件。如扎西整编中的“军改”即是发挥了红军由量的弱小向质的强大转化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在处理战略与战术的关系上，即从对待战略的举重若轻处考虑，从战术的举轻若重处准备，如毛泽东对二渡赤水的战略筹划与考量。二是自我否定性与自我超越性的历史蝶变。扎西整编是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充分认识到红军队伍当时存在的不得不克服的内在矛盾性与外在矛盾性，也是自觉运用辩证法对自身矛盾的一次“自我否定”，从而实现自身的“内在超越性”，是红军自我建设史上从径直外求向反向内求的重要历史转折。三是“不可胜”向“必可胜”的历史跨越。扎西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能为不可胜”的积极性因素和条件，由此促成了中央红军由数量的绝对劣势向质量的绝对优势的关键性变化，从而也促成了“单纯军事防御者”在遵义会议之前造成失败的普遍必然性向胜利的普遍必然性的历史转变。

（作者系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从“人进湖退”到“湖进人退”：高原湖泊人水互动关系新理念的构建

曹津永

高原湖泊是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窗口。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考察滇池、洱海等高原湖泊，并就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云南打响了“湖泊革命”攻坚战，推动高原湖泊水质实现根本好转。然而，由于水资源短缺、蒸发量大、地质条件特殊等因素，高原湖泊的保护治理仍是世界性难题。回顾历史，“向湖泊要粮要地”的“人进湖退”模式曾长期主导区域发展，但其代价日益显现。只有从根本上重构人水互动关系，推动从“人进湖退”到“湖进人退”的理念转变，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治理。

重构人湖之间的空间权力关系。传统“人进湖退”的模式建立在人类对自然的主宰和无限索取之上。历史上，滇池多次通过疏浚泄水、围湖造田等方式扩大耕地，1938年至1978年间水面因围垦缩小约38.8平方公里，这类行为虽短期满足人类需求，却长期损害湖泊生态。“湖进人退”理念则承认湖泊作为生命系统的内在价值与权利。自2009年起，滇池实施“四退三还一护”（退塘、退田、退人、退房，还湖、还林、还湿地，护水），逐步恢复湖滨生态。这种基于生态理性的空间归还，体现了从“绝对对人类主权”到“生态—人类权利平衡”的伦理转型，为划定生态红线、严格岸线管控奠定了学理基础。

重置湖泊在区域发展中的空间价值排序。传统发展观中，湖泊空间价值常被简化为直接经济效用——农田、建设用地、养殖区或旅游景观，在决策中往往让位于短期经济增长。滇池流域的土地利用变化清晰反映了这一点：1974年至2016年间，流域建设用地持续扩张，从主城区向北、向南蔓延，形成“摊大饼式”发展，不断围合水域，挤占生态空间。“湖进人退”理念则将湖泊“生态空间”提升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生命根基”与“核心资产”，湖泊所提供的淡水资源、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灾害缓冲等生态系统服务，是其不可替代的“本源价值”，关乎国家生态安全。

任何对其空间的侵蚀，都在削弱区域发展的长期韧性。因此，必须在空间规划与决策中，将湖泊生态空间的完整性与质量作为刚性约束和优先保障，实现从“发展优先下的环境补偿”到“生态安全前提下的发展适配”的逻辑转换。

反思湖泊空间功能认知的尺度与关联。以往“就湖治湖”的治理思路，往往将湖泊问题视为局部水环境问题，治理范围局限于湖体本身。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末，高原湖泊治理仍在这一框架下进行。1988年发布的《滇池保护条例》首次将保护范围划分为水体、盆地区及水源涵养区，标志着系统治理思维的萌芽。2012年的条例进一步划定三级保护区，2022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九大高原湖泊“三区”管控的指导意见》明确“两线三区”（生态红线和生态黄线，生态保护核心区、缓冲区和绿色发展区）的分区管控体系，并于2024年纳入修订后的《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这一过程体现了治理从点到面、从局部到系统的演进。“湖进人退”理念以流域整体观为基石，强调湖泊健康是整个流域自然过程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湖泊生态空间实为“流域生态网络”的核心节点，其保护必须维护该网络的空间连贯性与功能完整性。因此，治理行动必须从湖体拓展至全流域，从点源污染控制升级为全域土地利用与生态过程统筹。为湖泊“退让”空间，需要在流域尺度上协调调整土地用途、优化产业布局，真正实现系统性治理。

从“人进湖退”到“湖进人退”的理念转向，是生态文明建设在高原湖泊治理中的生动实践。这不仅是从根源上保障湖泊生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治本之策，也深刻启示我们：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必须保持克制、尊重边界、追求共生，为自然留出不可或缺的生存与演进空间。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本文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专项“云南省高原湖泊保护及环境治理对策研究”（批准号：XZX202504）的阶段性成果]

# “豹园”名称小考

王准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我国著名博物画家、邮票设计大师曾孝濂《自然而然：曾孝濂自传》一书，记述了其多年来从事科学、艺术事业的心路历程，也述及祖父曾鲁光私宅“豹园”，“豹园”之名蕴含曾鲁光个人志趣和对子孙之期许，影响了曾孝濂的人生道路。

## 曾鲁光与“豹园”

曾鲁光（1882—1956），字渔生，云南昭通人。早年科举落第后研习新学，1906年赴日本学习矿业，其间结识革命党人并于1909年加入同盟会。民国时期，他曾任湖南铜矿公司经理等职。

约1942年，曾鲁光回到昆明，在盘龙江畔营建私宅“豹园”。园内花木繁盛，为其家族聚居之所。1950年昆明解放后，他主动将“豹园”及财产捐献给人民政府，此举受到嘉许。

其孙曾孝濂在“豹园”中长大，园中的自然生机启蒙了他对动植物的浓厚兴趣，这直接影响了他日后投身博物绘画事业并取得突出成就。

## “豹园”得名探源

为何将私宅称为“豹园”？2024年11月24日，笔者曾就此询问曾孝濂先生，先生表示不知其祖父曾鲁光为私宅取名“豹园”的具体缘由。然结合曾鲁光之生平与学养，“豹园”之名富含中国传统文人意蕴，豹子形象早见于《诗经》《楚辞》等典籍，其文化关联主要有二：一为军事韬略（如“豹韬”），二与个人修养志趣相关（如“豹隐”“豹变”）。“豹园”之名显然属于后者。

“豹隐”之趣。“豹园”的第一层寓意在于“豹隐”，寄托了主人曾鲁光的隐居之志。“豹隐”典故出自西汉刘向《列女传》，以玄豹（即黑豹）藏身雾雨、润泽毛羽之意，喻贤者退居修身、远避世患，由此成为隐逸传统的文化符号之一。如唐代骆宾王诗中即有“我留安豹隐”之句，南齐谢朓也有“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之咏，皆以“豹隐”喻指高洁自守的隐逸情怀。

曾鲁光以此命名其昆明郊居的“豹园”，正体现了他在历经世事、壮年奔波之后，选择淡泊自处、远离宦海浮沉的晚年心境，深具传统文人的隐逸旨趣与风骨。

曾鲁光少年离乡，投身革命与实业，晚年卸甲归隐，营建“豹园”于昆明市郊，园名“豹园”正反映了他历经世事浮沉后淡泊名利、远离宦海的心境。同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文学学院教师；本文系2023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普项目“方寸间的‘大千世界’——博物君子曾鲁光”（项目编号：SKPJ2023030）的阶段性成果）



曾孝濂设计的《杜鹃花》邮票。作者供图

时，“豹园”地处城郊，闹中取静，也契合了传统文人“大隐于世”的意趣。因此，“豹园”之名可视为曾鲁光“豹隐”之志的外化，颇具险逸高洁之风。

“豹变”之道。“豹园”的另一重含义或在于“豹变”，寄托了曾鲁光对后代的殷切期许。“豹变”典出《周易·革卦》：“君子豹变”，原指君子如豹纹般变得华美鲜明，后多引申为修养精进、德业日新或顺应时势、成长蜕变之意。

曾鲁光教育子女重品德，常以“朝夕恪勤，守以敦厚”等古训教导子孙，强调勤奋笃实、诚信正直。同时，他亦注重培养子女的自主意识与能力，尊重其个人选择，曾告诫孙辈曾孝濂“要有主见，努力做该做的事”。这种教育理念，既包含品德上“迁善去恶”的“豹变”之义，亦蕴含能力上成长蜕变的期望。

得益于此，其后代在各领域皆有所成：其子曾以恕曾留学日本，归国后投身教育；孙辈中亦不乏从医、从军、从事科研者，皆为国家建设贡献己力，可谓实现了“君子豹变”的期许。

## “豹园”与曾鲁光家风

“豹园”之名蕴含“豹隐”与“豹变”之义，既是曾鲁光本人淡泊明志、廉洁自守的写照，也寄托了他对后代品德与才能并重的期许，形成了砥砺品行、进取有为的家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传统家庭美德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曾鲁光以其醇厚品行与责任担当为子孙树立典范，其后代亦在各领域加以践行与发扬。例如，其孙曾孝濂在科学绘画领域的执着追求与淡泊态度，正是这一优秀家风的当代体现。

“豹园”虽已成为历史，但其承载的传统文化意蕴与醇家风，在新时代仍具有启迪意义，值得传承与借鉴。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文学学院教师；本文系2023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方寸间的‘大千世界’——博物君子曾鲁光”（项目编号：SKPJ2023030）的阶段性成果）

# 沧阳杏青百年溯

## ——永胜一中教育史迹

本报记者 沈艳



1950年永胜中学师生合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校第一张照片。永胜一中供图

钟灵毓秀，凤出沧阳。永胜县第一中学，如一颗明珠镶嵌在滇西北。朱红色大门静立，“云南省永胜一中”七个大字苍劲有力，诉说着岁月的厚重。

校园内，一中大殿始建于明代，同治十年至光绪五年重建。这座榫卯木构建筑气势恢宏，是县内最大单体古建。殿内铜钟铸于明天顺四年，数百年指挥师生作息。烽火岁月里，中共地下党、“民盟”、“民青”成员以此地为据点，开展抗日救亡与反蒋斗争。钟名“醒钟”，寓意唤醒师生、唤醒世人。

《永北直隶厅志》载：“永郡僻处边隅，而人文蔚起，郁勃济济，代不乏人”。永胜一中的百余年发展史，正是云南边疆教育现代化的生动缩影。从1905年现代教育萌芽，到1934年正式建校，这所滇西北学府历经战火洗礼、社会变革与教育革新，折射出中国边陲教育从启蒙到振兴的壮阔历程。

学校前身可追溯至1905年创办的永北直隶厅中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政府明确规定“各府、直隶厅、州创立中学堂”。永北直隶厅遂依托凤鸣书院创办初级中学第一班。然而次年政策调整，永北的中学教育一度停办。

直至1933年底，永胜重新开始筹备初级中学。据《永胜县志》记载，以嵩山小学（原凤鸣书院）校长杜荣滨负责中学筹建，学校于1934年4月1日正式开学。1939年秋，学校改制为省立永胜初级中学，省政府委派范福增任校长。至此，永胜中学初具规模。

1942年，学校更名为永胜县立初级中学，尽管当时校舍简陋、师资匮乏，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该校却成为滇西北地区重要的文化堡垒。据记载，“值抗战时期，教师工资低，物价飞涨，生活艰苦，但外来教师仍能坚持教学”。永胜一中的意义已远超教育本身：它既是国家危难中“教育救国”理念的实践者，也是边疆民族接触现代文明的关键桥梁。抗日战争期间，永胜一中成为当地

爱国抗日运动的核心阵地。所有在永胜工作的党员，均以该校为基地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学校办在永胜，学生早属延安”这一说法，生动反映出永胜一中在特殊历史时期所承担的重要角色。1946年创作的《永胜中学校歌》中激昂唱出“我们读书，为了人民”，这些歌词展现出师生坚定的革命意志与爱国情怀，也成为永胜一中延续至今的精神遗产。

1950年，永胜县人民政府接管原有中学。1956年，学校改制为完全中学，定名为“云南省永胜县中学”，并于当年秋季招收首届高中班。1959年，该校更名为“云南省永胜县第一中学”。高中部的设立标志着学校从初级中学演进为完全中学。在“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政策指引下，学校招收大量少数民族学生，使彝族、傈僳族等边疆子弟首次获得系统教育的机会。

改革开放为永胜一中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80年代，学校被列为“云南省重点中学”。20世纪90年代，随着“普九”攻坚工程的推进，学校基础设施显著改善。2002年，云南省启动“边境学校建设工程”，永胜一中获得专项资金支持校舍扩建，标志着边疆教育从“保基本”向“提质量”转变。

进入21世纪，永胜一中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